

胡適研究論稿

耿云志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丛书

胡适研究论稿

耿云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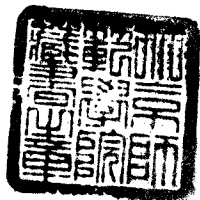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9374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1039374

责任编辑：蔡济生
封面设计：邱云松
版面设计：陈 维
封面题字：梁伯言

胡适研究论稿

耿云志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375 插页4 字数402千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50 册

书号：11118·163

(平装)定价：4.20 元

序

前辈历史学家大概都是怀着革命的激情来研究历史的。由于革命的正义性质，对历史研究工作的科学要求被看作次要的事情。在我们眼睛里，正义的事业自然是合乎科学的。所以也往往自信正义即是科学。这种思想多少出自于对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如下一段话的误解。列宁说：

“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列宁用马克思描述辩证法特点的话来概括他的全部理论（此话原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的本意是说，他在《资本论》中合理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所以他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这是马克思取得

0.709/22

科学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他心存顾忌，回避事实，或者论事以主观需要为准则，都不可能辩证地说明问题，取得科学成就。列宁引证马克思推崇辩证法的话，用以推崇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是略去其中这么一句，我们就产生一种误解，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所在，就是批判和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进一步简化为“造反”，甚至还有“大批判开路”之说，根本不问批判是否辩证地看问题和“不崇拜任何东西”。至于说马克思的理论把高度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更使我们不知不觉产生一种自信，仿佛科学性和革命性二者皆备于我，有时还把革命性提在科学性前面，表示革命性更重于科学性，而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来源于它的科学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同马克思本人或列宁的思想都产生了距离，而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历史的研究，又以推动现实的中国革命为目的，历史成了鼓动现实斗争的手段。有时出于对反动统治的厌恶和愤慨，借古讽今，虽与事实不尽相符，也自觉理直气壮，无可非议。有些历史问题，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简单公式实在无法应付，便视为禁区，不去研究，仿佛研究这种问题有利敌人，是不值得的或者是应当回避的。因此，我们的历史著作往往存在片面性：今古不分，以今例古；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只知己不知彼，只研究革命，不研究反革命，似乎视为理所当然。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产生这种偏向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最紧迫的谁胜谁负的生死问题吸引着。鼓舞斗志是第一义的事。参加革命队伍的历史学家们，当然必须围绕着这个最紧迫的需要进行工作。这并不是说，在那时片面性就是对的。而只是说，由于环境艰苦、形势紧迫，大多数人没有可能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可能充分地

详尽地占有历史材料。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紧迫需要和革命义愤的感情，很容易于不自觉中使人忽略对科学性的严格要求。就象范文澜、翦伯赞那样一些优秀的历史学家，后来也自觉到从前著述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偏向。其他人就更不消说了。

历史科学是实证的科学，既需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又需要占有极其大量的可靠的事实材料，没有长时间的冷静的研究功夫是难以说明历史真相的。革命胜利后，历史学家理应可以做这种长时间的冷静的研究工作了。不幸左倾教条主义妨碍了我们，以至过去的经验未能正确总结，上面指出的那种偏向，反而受到鼓励，以至更加发展。这种情况被野心家所利用，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四人帮”为其阴谋夺取权力制造历史根据的那些年里，竟达到了极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科学工作中，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是断不可少的。要做到冷静和客观地对待历史事实，就绝对需要科学工作者的诚实和无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最负盛名的哲学著作的最后一节，最后一段里这样说道：“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恩格斯的话是千真万确的。难道有谁能够证明，迄今被人们认识到的任何一条科学真理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违背的吗？所以，恩格斯的话说出了一条重要的真理：对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来说，它的大公无私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一致的。我们有志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理应有勇气对自己提出严格的科学要求：在自己研究工作的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去接近历史的真实（完全的绝对的符合历史真实是事实上难以做到的），避免为成见所蔽，为己意所蔽，避免片面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历史学由于澄清了过去的一些混乱，也打破了一些公式教条的束缚，具体深入的研究问题的空气日渐浓厚，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进步。在前进的这一步中，发掘的材料多了，涉及的问题多了，眼界扩大了，研究过细了，有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还表现了敢于面对事实，不为成见所蔽的勇气。耿云志同志的这本研究胡适的著作，即是一例。

作者在他的这本论著里，对胡适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是简单的政治批判，也不作任何回护，而是根据事实对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作用作了颇为鞭辟近里的分析，指出了他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可以说是比较接近真实了。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为了提高历史著作的科学性，这种态度是值得提倡的。当然，书中不准确的乃至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我相信作者会以谦虚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也希望大家通过讨论、切磋，共同提高。

黎澍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序 □黎 澍

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1
论胡适在文学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37
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	66
论胡适的实验主义·····	93
评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140
胡适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185
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胡适政治态度的变化·····	216
胡适与梁启超·····	240
胡适与陈独秀·····	271
附 录 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	292
 年谱（1891—1962）·····	 313
后 记·····	546

胡适与五四时期的 新文化运动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学者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是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一九一七年夏回国后，立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于次年被选入北大评议会，担任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和英文科教授会主任。同年正式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

胡适一生坚持政治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革命。因而是一位重要的反面教员。但对于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和他所起的客观作用，我们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本文即主要针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作一简要的评述，希望引起批评和讨论。

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赢得很大的声名，这首先是和他倡导白话文运动密切相关的。

一九一五年，胡适在美国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就在这一年，国内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问世。这个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中枢的革命刊物，很快就引起了知识界极大的注意。当时主持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以安徽绩溪同乡关系，给胡适寄去《青年》杂志，并受陈独秀（也是安徽人）之托，邀他给杂志写稿。于是第二年，胡适便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译稿。而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便把他鼓吹白话文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送登《新青年》。这篇文章把他一九一六年十月寄陈独秀信中所概括的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逐条加以解释和发挥。文中虽然没有“文学革命”的字样，也没有咄咄逼人的向旧文学挑战的气势，但由于它较系统地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具体主张，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发展观念，并提出了应“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的新鲜见解，因而这篇文章毕竟成了文学革命的开篇之作。紧接着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为中心的三大口号^①，不仅概括了文学革命的基本要求，而且改变了胡适的和缓的改良主义态度，使运动一开始就具有革命的气势。

陈独秀当时是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又是声誉日著的《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由他出来赞助文学革命，而且是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坚决态度，于是就使这一刚刚开始的运动，受到了全国的注意。文学革命遂成了全国规模

^① 见《新青年》二卷六期。三大口号是：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的运动。

后来，胡适又相继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继续强调“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①，应“用白话作各种文学”^②，并提出创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③的口号。郑振铎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是文学革命的一篇“最堂皇的宣言”^④。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还就新文学的创造问题，提出了一些古文家不曾梦见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如搜集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剪裁、布局的方法，描写的方法等等）。

然而，胡适自己承认，他本人及陈独秀、钱玄同等极力鼓吹新文学的几个人，都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⑤。真正为新文学奠立不拔之基的，乃是鲁迅先生。他的《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这篇小说，以其思想的深度和创作的技巧，立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标志着新文学的伟大成功。胡适在创造方面，主要的成绩只是白话新诗的“尝试”。一九二〇年，他的《尝试集》出版了。但胡适的白话诗，不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技巧来说，均非上品。只因为它是文学革命以来的第一部白话诗集，所以有一点开辟门径的作用。第二年，郭沫若的《女神》问世，唱出了一代青年的心声。

在今天看来，提倡白话文似乎毫不足奇。可是在当时，却是大为震动的一件事。古文通行了一两千年，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

① 《胡适文存》卷一，第46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③ 同上书，第71页。

④ 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第4页。

⑤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变化，但始终是做为人民大众语言文学的对立物而为少数贵族和文人士所垄断的东西。偶有文人作一点白话文学（诗歌、小说、戏曲等），多是失意者的寻求发泄与寄托，是一向被文坛斥为邪僻、没有合法地位的。白话文运动，尊白话文学为正宗，而宣判古文是半死的或已死的东西，主张以接近于人民口语的文学代替盛行了一两千年的古文学，这本身已经具有平民反对贵族的意味。更何况，由于古文长期充当腐败的封建思想的运输品，一旦古文完全被白话所代替，就使那些极端虚伪丑恶的旧思想失了藏身之所。在这一方面，它的革命意义就更明显了。

自从戊戌维新以来，在文化领域内，反封建的斗争曾屡起屡仆，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进入民国后，虽然封建皇帝被赶跑了，可是社会思想、文化生活，仍然深深地禁锢在封建的枷锁之中。袁世凯的称帝，清室的复辟，孔教的喧嚣，这一切，固然有着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但是，那一套腐朽没落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恰恰是裹着古文的外衣，欺骗和愚弄人民的。那些没廉耻的军阀政客，没灵魂的封建文人，要向社会推销他们的一套反动腐朽的思想、主张，古文乃是最适当的包装品。因为古文的“妙处”就在于它能粉饰假的、恶的、丑的东西，使人们见了往往不觉其假，不觉其恶，不觉其丑。因此，它常常被用作藏污纳垢的工具。用白话文代替古文，就剥夺了贵族阶级的世袭领地，掘开了封建文人的藏身洞穴。而对于广大青年，却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因为古文专讲求排比对仗等刻板形式，严重禁锢人们的思想。打破古文的桎梏，青年人再无须花费宝贵的精力去诵习那些无用的古文滥调。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学会用白话演讲和写文章，来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五四运动后，青年学生们办的白话刊物象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出现，白话文真有席卷全国之势。弄得

那些名震一时的古文大家们凄凄惶惶，失了凭借。所以，尽管白话文运动只是文学形式的改变，但却决不能因此低估它的意义。事实上在整个文学革命运动中，争论最多，斗争最激烈，取得成果最明显，最有普遍意义的，正是这种所谓文学形式的大变化。它受到了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最热烈的拥护，同时也受到了封建文人的最激烈的抵抗。

首先起来攻击白话文的是著名的古文学家林纾。但这位古文大家作惯了无病呻吟的陈腔滥调，一到得战场，毫无气力。他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却宣称“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胡适嘲笑道，既然象林纾这样的古文大家也说不出古文不当废的道理，“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①

一九一九年春，乘北洋军阀政府反对过激主义的声势，林纾再次发起攻击。他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教授的两条罪状：一条是所谓“覆孔孟，铲伦常”，另一条就是提倡白话文，“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是赞助白话文的。他的回信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维护了白话文与新文化的合法地位。林纾仍无所获^②，这个以清朝遗民自居的封建文人，还把打击白话文运动的幻想寄托于民国的权势人物徐树铮（林的门生）之流。他的毁谤性质的小说《荆生》就是这种幻想的极明白的表示。小说中写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影徐树铮），在少年田其美（影陈独秀）、狄莫（影胡适）和金心异（影钱玄同）三人聚在一起，指摘孔孟，提倡白话，说得正在热闹之际，突然闯进来大打出手，三人狼狈逃走。荆生见此情景，为之狞笑。林纾的幻想反映了一般古文家丧失了世袭领地的无比

① 《胡适文存》卷一，第41页。

② 林纾与蔡元培的信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恼恨和百计图谋报复的心理。就在林纾发表毁谤小说的同时，旧势力还想运动安福系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但没有得逞。于是他们又制造谣言来中伤北京大学，特别对新文学运动和《新青年》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进行人身攻击。社会上盛传，北京大学要驱出陈独秀、胡适等人，可见当时反动气焰的嚣张。结果，蔡元培等没有顶住旧势力的压力，乃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底，以取消本科学长制度为辞，将陈独秀解职。可是这并没有使陈独秀、胡适等人退缩，也不可能将白话文运动遏止。相反地，由于五四运动的爆发，白话文运动得到了无比的推动力。有人统计，一九一九年内，全国出现的白话刊物多达四百余种。严复幻想白话文会“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①，完全落空。

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现了由一小批留学生如胡先骕、梅光迪等办起来的反对新文学，鼓吹复古主义的《学衡》杂志。尽管这些人受过资产阶级学校的训练，但他们既然逆潮流而动，用一种过时了的破烂武器上阵，所以完全经不起白话文倡导者们的反击。胡适嘲讽他们说：“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鲁迅写一篇《估学衡》，立即照出了他们的浅薄和丑陋。

在北洋军阀反动黑暗的统治下，白话文运动居然凯歌行进，无可抵御。这是因为它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白话文运动虽是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它的实际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白话文运动是适应整个社会革命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从戊戌维新到清末的民主革命运动，从梁启超的新文体到清末盛行的白话报刊这一段历史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出，白话代替

^① 严复：《书札六十四》，见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96页。

古文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但那时之所以不能实现这一变革，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写作白话文的人们，只是为了政治宣传的急需，还不曾觉悟到，用白话代替古文这本身是一项必需的伟大变革，从而大力加以提倡。另一方面，当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尚未觉醒，还没有投入社会变革的潮流之中，因而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但到《新青年》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那时科学和民主两大口号，反映了最普遍的社会要求。科学就要广泛地研究事实，缜密地进行推理。古文讲究排比对仗，套用典故成语，追求文字古奥，不讲文法结构，所以很难充作科学的表现工具，它的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而民主这时不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而且也是正在觉醒的广大工农群众的要求。他们已经卷入社会变革的潮流之中，不可能要他们学通了古文，再来发表他们的主张。他们把自己的语言带进了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之中，白话之成为社会交际的工具，成了无法逆转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等人登高一呼，奋力提倡，遂演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但几个旧文人不能阻遏，就是军阀政府的当权者们也无可奈何。一九二五年，当上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想利用权势来剿杀白话文运动。他点名嘲骂白话文的首倡者胡适。胡适则直指章士钊是“反动派”，是“落伍者的首领”^①。以致于那时本已分裂的新文学各派人物一致对章实行反击。章士钊招架不住，失败而止。

鲁迅最能充分认识白话文的意义，他曾积极参加了对守旧派的反击。他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

^① 胡适：《老章又反叛了》，见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03页。

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①鲁迅的短篇小说的创造成功，当然首先应当归因于他具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但也不能忽视，得白话为表现工具的重要意义。请设想一下，如果《狂人日记》象鲁迅兄弟所译的《域外小说集》那样，用古文写出来，那么，它的社会影响必定要极大地缩减，而且也绝难发挥出那样夺人的艺术力量。

白话不但被证明是创造新文学的利器，而且还在传播新思想和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五四运动期间，白话传单和白话小报空前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反对亲日卖国贼的宣传，几乎家喻户晓，它的宣传力量实在是千万倍地胜过了官方制造的各种反动舆论。

一九二〇年，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决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胡适等人的白话文，遂成了风行一时的白话典范。从此，白话又成了教育的新工具。

由于报刊的盛行，教育的推广，几年之间，在全国成长起来整整一代青年，他们善于用白话作演说，写文章。其中大批进步分子、革命分子，后来纷纷参加到共产党或改组后的国民党队伍中去。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这些青年深入工厂、农村、兵营，发挥了巨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群众大革命的高潮。假若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仍只会子曰诗云的那一套古文滥调，那么这一场大革命几乎是难于设想的。当然，这决不是说大革命的高潮是由于白话文运动造成的。只是说，除其他

① 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卷二，第360页。

重要原因之外，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占有突出地位，而且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胡适，取得了几乎超过他所应得的声誉。当时许多大中学校争相延请胡适到校讲演，许多青年社团纷纷要求胡适给予指导。极有名的北京大学新潮社，就是在胡适的“顾问”之下诞生的。以后，新潮社的一些骨干分子如傅斯年，罗加伦、毛子水等几乎终生追随胡适。

应当指出，虽然白话文运动本身带有革命性质，但胡适在起初提倡的时候，他的态度却是改良主义的。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全无革命的挑战的勇气。不但如此，在阐述他的具体主张（即所谓“八不”）时，也颇多妥协的成分，缺乏彻底以白话文学取代古文学的坚决态度。当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时，胡适从美国致信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①后来胡适自己承认，如果没有陈独秀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奋力斗争，那么“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②。可见对于文学革命运动的迅速取得胜利，陈独秀实有大功。

此外，虽然以白话代替古文这种文学形式的改革，确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胡适过于局限在形式方面的改革，而把内容

① 《胡适文存》卷一，第39—40页、43页。

②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卷二，第157页。